

越窑秘色瓷及相关问题

郑嘉励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浙江 杭州市 310014)

关键词: 越窑; 秘色瓷; 贡瓷; 贡窑

摘要: 秘色瓷本是晚唐时期越窑贡瓷的名称, 其性质是贡瓷。秘色瓷之得名与釉色相关。作为贡瓷, 秘色瓷由“贡窑”所出, 在今天的研究中, 也可物化体现为越瓷精品。根据法门寺塔地宫出土材料讨论秘色瓷问题, 必须纳入贡赋、库藏制度, 不可脱离具体的历史背景割裂认识并刻意渲染。

Key words: Yue ware “private - color” porcelain; tribute porcelain; tribute porcelain firing kilns

Abstract: The so - called “private - color” porcelain references to the tribute porcelain yielded from the Yue Yao Kiln in the late Tang Period. Its naming is concerned with its glaze color. As a sort of tribute porcelain, it is produced from tribute porcelain firing kilns and can be taken as the cream of the Yue ware. Researches on the problems of “private - color” porcelain on the basis of the data unearthed from the crypt of the pagoda in Famen Temple should be carried out with the then tributary, taxing and treasure - administering systems taken into account; it should not be isolated from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there are no reasons to exaggerate anything intentionally.

前言

中、晚唐之际的越窑大发展, 有深刻的历史背景。

内因是, 越窑瓷器烧成工艺的突破, 匣钵的使用是划时代的工艺革新, 越窑青瓷自此真正展现色泽、质感之美。

外因是, 安史之乱后, 朝廷贡赋仰赖于东南。《新唐书·地理志》载, 长庆年间(821~824年)越窑瓷器正式列入越州的土贡籍^[1]。但越瓷对朝廷的进奉可能早于此, 约自8世纪后半期始进奉宫廷^[2], 终于长庆年间正式列入越州贡籍。贡瓷的出现是越瓷成熟的重要标志, 反之, 对朝廷的进贡也促使青瓷品质日益改进。

上述是为秘色瓷出现的重要背景。

一、秘色瓷是越窑贡瓷的名称

晚唐时期, 即“秘色瓷”名称出现之

始, 秘色瓷即越窑贡瓷的名称。

1988年发掘的陕西扶风法门寺塔地宫, 瘞埋于咸通十五年(874年), 出土了《应从重真寺随真身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器物宝函等并新恩赐到金银宝器衣物》账碑(后文称《衣物账》)及14件越窑瓷器, 其中13件碗、盘在《衣物账》中记作“瓷秘色”^[3]。

被称为秘色瓷的越窑碗、盘, 内底釉面光洁, 除两件釉色泛黄, 其余均呈湖绿色。碗、盘作葵口或花瓣口, 是晚唐流行的装饰风格。平底器的外底边缘有一圈形似“松子”的泥点, 也是常见的工艺特征。这批瓷器代表了越窑当时最高的工艺水平, 但不表示有特殊造型、配方和烧成工艺, 只是工艺流程中的各环节较一般产品更为考究^[4]。

《衣物账》罗列的金银珠玉、锦绣衣物、琉璃、秘色瓷等地宫物品, 均出自内库, 《衣物账》记载的宝物皆由“库家臣”监送。这批宝物, 除部分为朝廷所属作坊制

作,其余都是各地贡物^[5]。越窑秘色瓷,即由越州进贡内库,然后由内库转施入地宫。

可注意者,《衣物账》执笔者是兴善寺的僧人,法名“觉支”,生平与内库事务无涉。《衣物账》内的宝物光怪陆离,如“赭黄熟线绫长袄袂”、“蹙金银线披袄子”、“织成绮线绫床皂”、“结条笼子”、“银金花合”、“瓷秘色盘子”等,命名概括的特征涉及多门类手工业品的用途、色彩、形状、工艺。绝非一僧人或某人能力可及,即使觉支与众供养临时协商定名,也绝不能办到。合理的解释只能是,《衣物账》中各类贡物的名称,辗转录自内库的出物账册,而内库账册的贡物名称则本自各地的进奉物账或贡物本身的包装^[6]。

由此推知,“秘色瓷”就是晚唐时期越州贡瓷的名称,即越州贡籍或进奉物账中贡瓷的名称。该名称伴随贡瓷征收、包装、运输、贮存的全过程,录入内库的出纳账册,继而转录入地宫《衣物账》。“秘色瓷”一名的出现,不晚于瘞藏地宫的咸通十五年。

“秘色瓷”既然是越窑贡瓷的称谓,其性质当然就是贡瓷。宋·赵令畤《侯鯖录》谓“今之秘色瓷器,世言钱氏有国,越州烧进,为供奉之物,臣庶不得用之,故云秘色”,宋人认为秘色瓷是“臣庶不得用”的贡瓷^[7]。该意见大体可从。

二、秘色瓷作为越窑贡瓷的名称并不严格

越州贡瓷的历史至迟肇始于长庆年间,既然“秘色瓷”是贡瓷之名,为何“秘色瓷”一名晚至咸通十五年才正式得见呢?

越瓷列入越州常贡籍,始见于《新唐书·地理志》“越州会稽郡,中都督府。土贡:宝花、花纹等罗,白编、交梭、十样花纹等绫,轻容、生谷、花纱、吴绢、丹沙、石蜜、橘、葛粉、瓷器、纸、笔”的记载,是为“长庆贡”。此时越州贡瓷只称“瓷

器”,似尚无“秘色瓷”名。长庆年间距咸通十五年相隔半世纪,在此期间,贡瓷名称时有变化是正常的。

贡物名称之变化无常,越州贡橘是典型的例子。越州“开元贡”的贡籍中有“甘橘”^[8]。元和时越州则有“包橘之贡”^[9]。《新唐书·地理志》“长庆贡”越州贡籍则称为“橘”。橘是越州传统贡物,但贡橘名称不同时期却有“甘橘”、“包橘”、“橘”之别。“橘”前冠以“包”字,犹如“瓷”前冠以“秘色”,于今看来固然费解,但纳入贡赋制度考察犹有迹可寻,“橘”是平实的称呼,就像直称“瓷器”,“包”是对贡橘包装的强调^[10],犹如“秘色”是对瓷器某些特征的强调。如此,“瓷器”与“秘色瓷”可能也是越窑贡瓷在不同时期的同物异称。

秘色瓷的名称出现之后,秘色瓷作为越窑贡瓷的称谓在使用中也不严格。《册府元龟》、《宋会要辑稿》载钱氏吴越国对中原大朝的进贡,是当时宫廷档案的实录,其中涉及瓷器的进贡,或记作“秘色瓷器”,或作“瓷器”,有时甚至作“越器”,称谓极不固定^[11]。这说明,“秘色瓷”通常只是越窑贡瓷的美称,贡瓷多名并存、随时更易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

从《宋会要辑稿》载熙宁元年越州土贡“秘色瓷器五十事”看,秘色瓷作为贡瓷名称,至少正式沿用至北宋神宗朝^[12]。

三、秘色瓷因越窑青瓷的釉色得名

秘色瓷的性质是问题讨论的主要方面,另一问题是,秘色瓷因何得名,即越窑贡瓷何以称“秘色瓷”?

目前关于“秘色”的含义,仍有不同理解。^[13]但综观当时的各类手工业品贡物,命名遵循有一般的原则,如《衣物账》中“赭黄熟线绫长袄袂”、“织成绮线绫床皂”、“结条笼子”、“银金花合”等,命名多描述

手工业品的材质、色彩、形状、装饰、工艺或其他，至于具体并无一定之规。

秘色瓷，“瓷”指材质，“秘色”指的是釉色、工艺抑或其他，我认为以釉色为是，因为釉色才是瓷器最直接的、显著的特征。

“秘色”具体指哪种釉色，则不能肯定。“秘色”可能是文学性的描述语言，难以机械的标准苛求。鉴于湖绿色是较难烧成的釉色，也是今人以为上品的釉色，拟之于“千峰翠色”似乎也恰当，“秘色”当指湖绿色的可能性为大。

“秘色瓷”是对贡瓷色泽特征的描述，并无神秘可言。秘色瓷作为越窑贡瓷的称谓并不严格，如越州贡橘有时称“甘橘”，有时称“包橘”，北宋建州贡茶有时称“龙凤团”，有时称“建茶”。“包橘”是对贡橘包装的描述，“龙凤团”是对建茶式样的形容，虽能部分反映历史信息，但其本质终究只是寻常的命名，别无深意。

四、秘色瓷由上林湖“贡窑”所出

法门寺塔地宫的14件越窑秘色瓷，由以今浙江慈溪上林湖为中心的窑场生产，已为学者之共识。

唐代来自民间的贡物，多由固定的贡户生产。贡户由官府指定，多家传技艺，世袭其业^[14]。瓷器手工业技术性强，也当如此。贡瓷户具有出色的制瓷技艺，他们名在贡籍之上，但与官府工匠不同，只是以贡代税、以贡代役的平民，也就是来自民间但兼有官差的手工业者。

1977年上林湖吴家溪出土的“贡窑”铭墓志罐，其铭曰“府君凌倜，……中和五年岁在乙巳三月五日终于明州慈溪县上林乡石仁里石贵保。……光启三年岁在丁未二月五日，殁于当保贡窑之北山，其坟丙向”。墓主人下葬于光启三年（887年），贡窑被作为墓葬所在的地望标志^[15]。

“贡窑”是负有贡瓷生产任务的贡户所主之窑场。贡瓷户世袭其业，这决定了“贡窑”在较长时期内方位相对固定，故能为墓志引作标记地望的参照。

“当保贡窑之北山”，在贡窑前冠以“当保”的限定词。唐制，三家为一“保”，“保”是里下的组织，一保之地范围甚小，今上林湖一带晚唐时当然不止一保。墓志的出土，表明上林乡石仁里石贵保“贡窑”仅此一处，且在当地为人共知，否则就难以用作地望的标志。但上林湖“石贵保”以外，可能还有不止一处的贡窑，否则不必在贡窑前冠以“当保”二字^[16]。

贡窑是当时生产贡瓷（秘色瓷）的窑场，但贡瓷户除生产贡瓷，也生产商品瓷。贡瓷户完成官府摊派的贡瓷定额之后，才可将瓷器自由出售，这正是徐夔《贡馀秘色茶盏》诗“陶成先得贡吾君”的含义。

事实上，上林湖不存在超然于众窑之上的特殊窑场，精品与粗品在众窑中均占有一定比例，贡瓷是精品，商品瓷因销售对象的不同，则不必各色俱精。贡窑生产秘色瓷，但依然是以商品化生产为主要特征的民窑，所谓别有“秘色窑”的说法，诚属无稽。

五、秘色瓷物化体现为越瓷精品

帝王陵寝、勋臣墓葬，或者朝廷施舍的佛塔地宫中出土的越窑贡瓷，数量有限。可明确判断为贡瓷的实物，决不会太多。

但是，秘色瓷既然是贡瓷，就可以物化表现为越窑瓷器的精品。今人可以通过唐宋时期的窑址、墓葬中的精品瓷器对秘色瓷形制、釉色、工艺作深入研究。就上林湖窑场各窑的精品瓷器论，胎、釉、造型、装饰、工艺特征都颇雷同。过分强调秘色瓷的苛刻标准，以为“秘色瓷”只有法门寺地宫的区区几件，无异于作茧自缚。事实上，与法门寺地宫越瓷同等特征的产品，在上林湖为中心的窑场并不少见。所谓“贡瓷”，本来

就是当时众多精品瓷器中被选作贡物的极小部分,常贡有定额,进奉的数量虽不固定终究也有定数,不能认为落选的或未经遴选者过目的瓷器品质必定不及贡瓷。

浙江从事瓷窑址考古的学者,多不过分纠缠于“秘色瓷”的名实争论,主张“秘色瓷”是唐宋时期越窑精品瓷器之谓^[17]。从今天便于研究、赏鉴秘色瓷的角度看,这是切实可取的意见,也是今天该持的务实态度。

余 话

秘色瓷本是越窑贡瓷的名称,其性质是贡瓷。贡物惯常为各地的土特名产,对朝廷的长期进贡最易造就名牌产品。“秘色瓷”名声鹊起,亦由此途。

但能被选作贡品的瓷器毕竟少数,冒牌贗制必随之而生,商品瓷冒称“秘色瓷”的可能性必然存在,这是私有制下商品生产的常见情景。“秘色瓷”本是越窑贡瓷,但事实上被称作“秘色瓷”的却未必都是贡瓷,这意味着“秘色瓷”的概念存在不断扩大的可能性。宋代以降,文人笔记中的“秘色瓷”概念外延不断扩大,有时甚而作为青瓷的泛称,或正源于此。

在历史上,某一事物的命名有其随意性,会因时、因地、因人不同而有所差异,而事物本身不断变化,语言的内涵、外延也有伸缩的可能。千年以下,名与实的关系往往错综复杂,本极寻常的事物,后人竟不可究诘,这类事例俯拾皆是,又何独“秘色瓷”?惟其如此,才能体认将秘色瓷紧扣历史背景考察的重要性。

晚世文人及现代的某些学者,脱离具体的晚唐历史背景,对秘色瓷孤立研究、刻意渲染,遂使问题日益复杂化、神秘化,终至于聚讼纷纭,不可究诘。实际上,综合考察法门寺塔地宫的《衣物账》及秘色瓷实物,结合中晚唐贡赋制度、库藏制度及上林湖越

窑考古的既有成果,今天早已具备还原秘色瓷本来面目的基本条件。

- [1] 《新唐书·地理志》载“越州会稽郡,中都督府。土贡:宝花、花纹等罗,白编、交梭、十样花纹等绫,轻容、生谷、花纱、吴绢、丹沙、石蜜、橘、葛粉、瓷器、纸、笔”。按,王兴《唐代土贡资料系年——唐代土贡研究之一》(《北京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认为《新唐书·地理志》的土贡史料为“长庆贡”,李锦绣认为《新志》所载州县沿革、户口、州铭记土贡并非同一时期者,可能综合多种资料而成,但绝大多数是长庆贡,仍将《新志》土贡定为长庆贡,见: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下卷(第二分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929。
- [2] 唐代的贡物列入地方贡籍之前,通常先有进奉的阶段,然后由临时进奉向常贡额转化。越窑瓷器的进奉可能始于8世纪后半期,这与安史之乱后贡赋依赖于东南地区的形势有关,也与饮茶风尚在上层社会的流行有关,中唐诗人顾况、孟郊曾有诗歌赞美越窑茶碗(瓯),陆羽《茶经·茶之器》更首推越窑茶具,可以作为越瓷已于8世纪进奉朝廷的旁证。
- [3] 齐东方:《唐代金银器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14~15。依碑文原状录有《衣物账》全文。笔者按,《衣物账》称“瓷秘色”,将材质置于限定词“秘色”之前,颇不符汉语习惯,有学者意其为“秘色瓷”之误。《衣物账》在转录时笔误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如《衣物账》中“红异纹绫”、“白异纹绫”、“可幅”、“缘绫”等,都是各地贡绫的本名,“某某纹绫”的命名方式,习见于各地土贡,“可幅”与“缘绫”则见《旧唐书·李德裕传》浙西对朝廷的进奉。但《衣物账》第22行,将“可幅”误作“可副”,“纹谷披衫”之“纹谷”也可能是“谷纹”之误,《唐六典》载荆州土贡有“方谷纹绫”,而“纹谷”似不通。“谷纹”讹作“纹谷”,“瓷秘色”或即类此。因此故,笔者在后文径称为“秘色瓷”,而不拘泥于《衣物账》称“瓷秘色”。
- [4] 本文对地宫秘色瓷特征的概括,系据陕西省法门寺考古队《扶风法门寺塔唐代地宫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0期)及《越窑·秘色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相关论文综合。
- [5] 地宫宝物出自内库的论述,参见:

- a. 齐东方. 唐代金银器研究: 12.
 - b. 韩伟. 法门寺地宫金银器铭文考释. 参见: 磨砚书稿——韩伟考古文集.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1: 262.
- [6] 地方在进贡时, 对贡物有精心包装, 题以“名称、数量、进贡者”等内容, 并将名数录入贡物账。入藏于朝廷内库后, 内库的出纳财物, 亦有出纳账册登记。参见:
- a. 李锦绣. 唐代财政史稿·下卷(第二分册第四章《内库收支》)。
 - b. 葛承雍. 法门寺地宫珍宝与唐代内库。(《首届国际法门寺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选集》,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2 年)
 - c. 葛承雍, 唐代国库制度. 西安: 三秦出版社, 1990: 137~157.
- [7] 宋·赵令畤. 侯鯖录(卷六“秘色瓷器”. 北京: 中华书局, 2002. 宋·曾慥《高斋漫录》、周辉《清波杂志》等亦有类似记载。
- [8]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中华书局, 1983 年) 卷二十六《江南道二》越州“开元贡”: “甘橘, 甘蔗, 葛根, 石蜜, 交梭, 白綾。”王兴兴(《唐代土贡资料系年——唐代土贡研究之一》)考订为开元二十六至二十九年贡。
- [9] 《元稹集》(中华书局, 1982 年) 卷第五十三《唐故越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浙江东道观察等史赠左散骑常侍河东薛公神道碑文铭》: “旧制, 包橘之贡取于人, 未三贡鬻者, 罪且死。公(薛戎)命市贡之鬻者无所禁, 旬月之内, 越俗无余弊。”查吴廷燮《唐方镇年表》卷五“浙东”, 薛戎任浙东观察使, 事在元和十二年正月至长庆元年。
- [10] 唐·刘肃《大唐新语》卷十三《谐谑第二十八》: “益州每岁进柑子皆以纸裹之。他时长吏嫌纸不敬, 代以细布。既而恐柑子为布所损, 每怀忧惧。”(中华书局, 1997 年)
- [11] 宋·王钦若《册府元龟》卷一六九《帝王部》“纳贡献”门, 列有多条吴越国对中原大朝的进贡, 其中瓷器记作“金棱秘色瓷器”、“秘色瓷器”、“金银棱瓷器”或“瓷器”; 《宋会要辑稿·蕃夷》七“历代朝贡”条: “(太平兴国三年) 四月二日, 倣进银五万两, ……瓷器五万事, ……金钁瓷器百五十事……”。太平兴国二年三月三日贡事, 进献的方物中有“银涂金钁越器二百事”, “越器”也有可能是瓷器。
- [12] 《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一之四〇至四一: “神宗熙宁元年十二月, 尚书户部上诸道府土贡物……越州, 綾一十匹, 茜绯纱一十匹, 秘色瓷器五十事。”
- [13] 有学者以为, “秘色”是某种植物的颜色, 以其形容青瓷的釉色; 或以为, 当时惟越窑能烧成上品釉色, 且釉色不能随意控制, “秘色”有“神奇之色”之意; 或以为, “色”有等级的意涵, 与釉色无关, “秘色瓷”即上等的瓷器; 或以为, “秘色瓷”得名与匣钵的使用有关。参见《越窑·秘色瓷》、《浙江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五辑“2002 越窑国际学术讨论会专辑”(杭州出版社, 2002 年) 中的相关论文。
- [14] 王永兴于《唐代土贡资料系年——唐代土贡研究之一》中, 以元稹《古乐府》中的“贡綾户”、柳宗元《捕蛇者说》中的“贡蛇户”为例说明贡物由固定贡户生产的情形及其特征。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下卷) 第二分册, 第 959~960 页“土贡的来源”), 对该问题有更具体、明晰的阐述。
- [15] 阮平尔. 唐光启三年瓷质罐形墓志及相关问题的讨论. 东南文化, 1989, (2)。
- [16] 郑建华《越窑贡瓷及相关问题》(《纪念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建所二十周年论文集》, 西泠印社 1999 年) 一文, 于“贡窑”名实考辨甚多创见, 本文观点参考了郑文的意见。
- [17] 牟永抗、任世龙先生在相关著述中, 均持此种意见。

(责任编辑: 辛 革)